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第四辑·第十五卷)

[清] 梁启超
(1873年~1929年)

“新民”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四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
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 5

ISBN 7 - 80135 - 740 - X

. 中... . 北... . 教育名著 - 作品综合集 - 中
国文学 . 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29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四辑
[清]梁启超“新民”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1/32 印张: 195 字数: 5066 千字

ISBN 7 - 80135 - 740 - X

全二十册定价: 526.00 元(册均26.30元)

(ADD: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
P. C. : 100024 Tel: 010 - 65477339 010 - 65740218(带 Fax)
E - mail: webmaster@BTE - book. com Http: //www. BTE - book. 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 年 4 月

目
录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第四辑·第十五卷

[清]梁启超“新民”教育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

上 篇

梁启超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

生平和著作	(1)
时务学堂的教育实践	(7)
维新活动和教育实践	(10)
改良维新的教育理论和改革方案	(13)
(一) 论教育的作用	(13)
(二) 培养“新民”的教育目的	(15)
(三) 抨击封建教育和改革科举制度	(17)
(四) 改革学校教育的方案	(19)
(五) 主张男女平等, 提倡女子教育	(23)
晚年的讲学和著述	(25)
近代教育模式的建立和传统儒家传播体系的崩溃	(27)
教育思想体系	(39)
(一) 主张“开民智”, 提高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	(39)
(二) 变科举、兴学校的教育主张	(42)
(三) 提倡女学和师范	(47)
(四) 介绍西书, 宣传西学	(50)
(五) 引进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方法	(55)

(六) 运用推广资产阶级的治学方法和研究方法	(60)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	(64)

下 篇

梁启超教育论著选读

《变法通议》导读	(71)
论学会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78)
强学会封禁后之学会、学堂、报馆	(82)
论科举 光绪二十二年(1896)	(84)
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 光绪二十二年(1896)	(87)
学校总论 光绪二十二年(1896)	(89)
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 光绪二十三年(1897)	(98)
教育政策私议 光绪二十八年(1902)	(101)
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 1917年1月	(108)
倡设女学堂启 光绪二十三年(1897)	(117)
新民说(节录)	(121)
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121)
释新民之义	(125)
论公德	(127)
论权利思想	(133)
论自由	(144)
论进步	(154)
论立法权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170)

保教非所以尊孔论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177)
论正统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187)
敬告我同业诸君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194)
敬告当道者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200)
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	
.....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212)
释 革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224)
敬告我国民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229)
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	梁启超(235)

上 篇

梁启超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



生平和著作

梁启超是中国 19 世纪末叶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积极参加戊戌变法运动,大力宣传维新变法理论,在同封建顽固派的论战中,笔锋犀利,所向披靡,因而声名卓著,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时人合称“康梁”。

梁启超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在哲学、史学、文学、伦理、教育、政治理论等领域都有许多建树。作为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和清华研究院的导师,他在中国教育史上也留下了许多丰富的遗产。他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愧为一名杰出的思想家、宣传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他一生经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重大的历史事件。梁启超的政治生涯和思想,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以戊戌维新变法失败为分界线。前一个阶段,他是进步的,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的先进分子;后一个阶段,政治上渐趋保守,但在 1903 年以前,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仍然继续宣传西学,对中学、旧学有所批判,对当时的学术界、教育界有过积极的影响。

1903 年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逐渐成长活跃,他则堕落为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保皇派。

梁启超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祖父梁维清,是秀才,当过教谕,即管理一县文教事业的小吏。父亲梁宝瑛,屡试不第,连个秀才也没有捞到,最后只能做个私塾先生,教授乡里。可见梁氏家族在当时地主阶级的行列中,地位不高。父辈把希望寄托在梁启超身上。他们企图通过科举的途径,让他跻身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

书香门第的家庭,使梁启超能够较早地接受教育。他从4岁起开始读“四书”、“诗经”,听祖父谈古豪杰嘉言懿行;6岁跟随父亲受中国略史、“五经”;8岁学作八股文,9岁能够写上千字的文章。总的来说,梁启超在10岁以前受的是家庭教育,并未外出就学。他自己在《哀启》中说:“启超启勋及群从昆弟,自幼皆未尝出就外傅。学业根柢,立身藩篱,一铢一黍,咸禀先君子之训也。”

1884年,梁启超到广州应学院试,考中秀才。当时他才不过12岁,这对梁氏家族,实在是一件大事。梁启超祖父的功名,也不过如此;而乳臭未干的梁启超,竟然后来居上。

科第的成功,宗族的赞扬,前辈的期望,使梁启超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欢乐和信心。

1888年,梁启超成为广州学海堂的正班生,同时又做菊坡、粤秀、粤华等书院的院外生。在四年左右时间里,他如饥似渴,刻苦攻读,钻研了大量的经、史、子、集,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汉学基础,成为学海堂出类拔革的高材生。

次年(1889年),他应广东乡试,一举中的,榜列第八名举人。主考李瑞菴嘉其才华,把堂妹许给他。

1890年春天,梁启超到北京参加会试,没有考取。回来后,途经上海,购得《瀛环志略》等书,开始接触西学,“始知有五大洲各国”,初步打开了知识眼界。

到广州后,继续在学海堂求学。这一年8月,梁启超的同学陈千秋,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学问和思想,引起了他的求知欲望。他和陈千秋两人拜谒了康有为。

经过康有为的一番恳谈教导,梁如“冷水浇背,尽失故垒”,遂拜康有为为师,执弟子礼。这一次拜谒,成为梁启超一生中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重大转折点。

后来,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回忆了他第一次会见康有为的情形:

“其年秋,……乃因通甫(即陈千秋)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以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推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在万木草堂学习期间,他接受了康有为比较系统的改良主义思想的熏陶。今文经学使他获得变革现实的武器,对欧美资本主义的了解使他开阔了眼界。梁启超对康有为的讲学深为佩服,他回想当时的情景:

“先生为讲中国数千年来学术源流,历史政治沿革得失,取万国以比例推断之。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从此以后,梁启超成为康有为最得意的门生和主要助手。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民族的危机,促使梁启超开始关心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这样,梁启超就逐步由一个普通的封建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探索和拯救祖国命运的维新志士。

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史称“公车上书”,震动了当时朝野。梁启超这位年轻的维新志士,跟随康有为一起,投入了现实的政治斗争潮流。他四处奔走,八方联络,表现出组织方面的杰出才干。草奏折,写文章,显示了

在文字宣传方面的卓越才能。在这场斗争中,他结识了一大批维新志士。这一切,都为他在以后的维新运动中,发挥更大作用创造了条件。

这次“公车上书”虽然由于顽固派的阻挠,转送给皇帝光绪,没有结果,但是举人们的上书请愿,在当时的社会毕竟是一件不平凡的举动,它使一潭死水的清朝政局,激起了一阵波浪。

接着,梁启超协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创办《中外纪闻》。也由于顽固派的阻挠破坏,两者分别被迫解散和停刊。京师的维新运动转入低潮。

1896年,梁启超离京抵沪,创办《时务报》,并担任主笔。在他们周围,团结了马相伯、马建忠、严复、谭嗣同、容闳、章太炎等一批维新志士或同情者,作为撰稿人。梁启超本人也在《时务报》上先后写了《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重要政论。在他那些“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的文章中,系统地宣传了变法维新的理论,并同封建顽固势力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当时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所以《时务报》创刊后,几个月之内,就销售一万多份,风靡一时,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喉舌。梁启超的名声亦由是噪起。

1897年,梁启超离沪,就任长沙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他以万木草堂的教学原则为蓝本,制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0章。通过教学,着重培养学生具有变法维新的意志,阅读儒家著作及历代治乱兴衰的记载,参考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研求治国的道理,为维新变法事业培养了一批出色的人才。

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梁启超协助康有为倡行新政,除草拟废八股折、定大学堂章程外,又草定奖励工艺、奖制新器的章程。

光绪皇帝也亲自召见梁启超,命呈《变法通议》,赏六品衔,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到日本。此后他在政治上逐步趋向保

守,但直到1903年以前,他在传播西学方面仍起着广泛而富有成效的思想启蒙作用,给予当时的学术界、教育界以深远的影响。他曾以《自励》为题作诗:“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表达了他要继续探求真理的信念。

梁启超在此时撰文介绍了西欧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学术思想,如霍布士、培根、笛卡儿、卢梭、康德、孟德斯鸠、达尔文等人的思想,还有资产阶级在政治、哲学等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以及西方一些国家的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从而打开了原来只知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的封建传统文化的人们的眼界,给他们(特别是青年)灌输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让他们懂得了除中国传统的旧学外,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广阔的知识海洋中,还蕴藏着那么多的精深学问。仅就这一点来说,梁启超算得上是影响了一整代中国青年的启蒙大师。

郭沫若在他的一段回忆中曾经公正的指出了这一点:

“那时候,梁任公已经成了保皇党了。我们心里很鄙屑他,但却喜欢他的著书。……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一个革命家的代表。……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象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1905年,《民报》创刊于东京。后以《民报》与《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展开了思想论战。在论战中,梁启超站在保皇派的立场,鼓吹“忠君保皇”,他污蔑中国人民能力低下,无法实现共和。说什么:“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这些观点,遭到了孙中山、章太炎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批驳。

郭沫若:《少年时代》。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

1907年,梁启超在东京组织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政闻社被封后,他支持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发表了大量鼓吹君主立宪的文章。这段期间,梁启超实际上已经成为立宪派的首领。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自海外归国,出任共和党党魁。后又组织进步党,拥护袁世凯,出任司法总长。1915年,袁世凯称帝,求其赞同帝制。他多次上书,婉词力谏,反对变更共和国体,而策动蔡锷组织护国军反袁。继又组织研究系,与段祺瑞合作,出任财政总长。这期间梁启超混迹于北洋政坛,但为期不长。随段祺瑞的辞职,1917年底梁启超也一起离开了北洋政府,从此结束了他从政做官生涯。

以后,约十年左右的时间,梁启超专门从事教育和文化学术事业,他担任过清华、南开等大学的教授,清华研究院导师。他晚年撰写的重要著作有:《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他一生著书甚丰,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教育、历史等许多领域。后被合编为《饮冰室合集》。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57岁。

梁启超有关教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

《变法通议》(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1896年)。这是梁启超在上海主编《时务报》时发表的早期政论。他在《变法通议》中,针对当时中国的落后情况,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他还特别强调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制度,要注重师范(师范教育)、女学(女子教育)和幼学(儿童教育)的建立。

《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1897年)。这是梁启超晋谒湖广总督张之洞后写给张的信。信中论述了“培养人才为当务之急”,中国不应只局限于建立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诸类型的学校,更应当注意设立政治学院,培养一批懂得政治法律,主张变法维新的行政管理人才。学校的课程应注意学以致用,“学非一业,期于致

用；言非一端，贵于可行”。《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1897年）。这是梁启超写给杭州知府林启的信。林启曾开办求是书院。信中梁启超重申政法之学的重要性。“今之中国，其习专门之业稍有成就者，固不乏人，独其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盖不多见”。梁启超建议书院的教学应采用“中西兼举，政艺并进”的方针，教授则宜挑选“通古今、达中西”的通学大儒为最佳人选。

《教育政策私议》（1902年）。这是梁启超逃亡日本主编《新民丛报》时写的一篇教育论文。文中论述了“教育次序”，他按照学生身心发展的情况，把教育划分为：幼儿期、儿童期、少年期、成人期几个阶段，并设计了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教育制度表”（即学制图）。学校经费则主张由市村之公产及征学校税以充之。建议国家“制定小学章程，评定其管理法及所授课目，颁之各区域使其遵行”。他还强调要编写教科书。凡每一学校区，则设一教育会议所，管理经费。每省置视学官三四人，分巡各学区，查察管理方法和课程。

《新民说》（1902—1903年）。这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连载的长篇论文。他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他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新一代的国民——即所谓“新民”。他阐明了这种“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他并且还详细地论述了“新民”应具备的特性和品质。

时务学堂的教育实践

当北京、上海的维新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资产阶级维新派另一个重要人物谭嗣同也在湖南点燃了维新运动的火炬。

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和学政江标,都是倾向维新的官吏,赞同变法。在谭嗣同的积极推动下,他们一起创办了时务学堂,组织了“南学会”,出版了《湘学新报》和《湘报》。1897年冬天,他们聘请梁启超由上海来到长沙。梁启超在这期间一面担任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一面积极协助谭嗣同推动湖南的维新运动,使湖南成为当时维新变法运动中最活跃的地方。

梁启超就任后,他运用和发展了康有为当年办万木草堂的经验,把时务学堂办成当时最负盛名的一所学校。

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提出,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透彻,根柢既植,然后以其余日肆力于西籍,夫如是而乃可谓之学”。简而言之,就是一种中学、西学兼习的教学方针。根据这个方针,他把时务学堂的课程分作普通学和专门学两大类。普通学设有诸子学、经学、公理学和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专门学设有公法学、掌故学等。

他所制定的《学约》总纲十条:

(1)立志。学者应以立志为尚。“志不立,天下无可为之事”。应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伟大抱负。志既立,必须坚持不懈,“养之使勿少衰”。

(2)养心。学者既有志于道,则不应为富贵名利、耳目声色所诱惑,要经得起利害毁誉、苦乐生死的考验。养心的功课有二:即静坐和阅历。目的在于“一敛其心,收视返听,万念不起,使清明在躬,志气如神”。

(3)治身。学者应对自己的言论、举止,严加约束,注意端庄、谨慎,不要以为是“小节”而自我放任。每日就寝时,用曾参“吾日三省吾身”的方法来检查自己,错误就会日益减少。

(4)读书。读书则应中西兼习,专精和涉猎结合。“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西书四者,间日为课焉。度数年之力,中国要籍一切大义皆可了达,而旁证远引于西方诸学,亦可知崖略矣”。读书要做札

记,分为专精和涉猎两部分,将每天读过的书,“登新义数则,其有疑义,则书而纳之,待向匭以待条答焉”。

(5) 穷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格致制造之学”,所以昌明发达,扬名世界,都是因科学家、技术专门家努力发现和发明之所致。我们学者应深入钻研,为“他日创新法、制新器、辟新学”打好基础。因而“穷理之功课,每刚日诸生在堂上读书,功课毕,由教习随举目前事理,或西书格致浅理数条以问之,使精思以对,对既遍,教习乃将所以然之理揭示之”。

(6) 学文。学者必须在文字上下功夫,“当以条理细备,词笔锐达为上”。学文之功课,每月应交作文一篇。

(7) 乐群。同学之间应互相观摩、学习,“每月以数日为同学会讲之期,诸生各出其札记册,在堂互观,或有所问,而互相批答,上下议论,各出心得,其益无穷”。

(8) 摄生。学习生活应有张有弛。“起居饮食,皆有定时,勿使过劳”。同时,要加强体育锻炼。

(9) 经世。学者要熟悉中国和西方古代治国之法,要仔细考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以图强之道”。并参考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章程之书”,然后才可以称得上“经世”。经世之功课,“由教习随举各报所记近事一二条,问诸生以办法,使各抒己见”。

(10) 传教。“堂中所课,一切皆以昌明圣教为主义”。

作为总教习的梁启超在他管理时务学堂的短暂过程中,显示了他的教育改革家的气魄和才华。

他通过教学活动,大力宣传康有为那套变法理论:公羊学派的历史观,改良主义的政治论;广泛地介绍西学,对封建顽固派的旧学大加批驳等等。这样就使不少深受封建思想桎梏的时务学堂学生大开眼界,给久处在闭塞中的中国知识界、教育界,吹来一股新鲜的气息。

《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记载:梁启超在课程上进行了一些改

革,学生在入学六个月以前,读普通学;六个月以后,则各认专门,但普通学仍须兼习。学生所读之书,有涉猎之书,有专精之书。学习时学生须先反复钻研《春秋公羊传》和《孟子》中的微言大义,民权思想,然后择取中外政治法律比较参证,使之明了维新变法的旨意。。

梁启超对学生作业的批改也十分认真,“ 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 ”。对学生在作业中所表现出的某些进步观点,他极力予以热情鼓励。例如:学生课卷提到废拜跪之礼,梁启超批语说:“ 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废去拜跪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 ”。 通过时务学堂的教学,为维新变法培养了一批出色的人才,蔡锷、范源濂等人,都是当时时务学堂的学生。

维新派在湖南活动虽然搞得很有起色,但当时湖南顽固势力也很嚣张。以王先谦、叶德辉为首的顽固派,运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向维新派疯狂进攻,他们污蔑梁启超“ 专以无父无君之邪说教人 ”,使学生“ 误入歧途 ”。并要把他驱逐出境。在顽固派的强压下,梁启超被迫离开长沙回到上海。但时务学堂的进步意义却不是封建顽固势力的诽谤所能消减得了的。湖南学术界、教育界的进步人士赞誉梁启超来湖南主持时务学堂,“ 以振新政艺为大宗 ”,实是“ 湘人厚幸 ”。

维新活动和教育实践

梁启超出身于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候读了不少中国古代的经史典籍,十岁应童子试,聪颖过人,有“ 神童 ”之称。十七岁中举

参见《湘报》第一 二号。

《总教习梁启超批》:《觉迷要录》卷四。

《湘报》第 44、55 号。